

WORLD AGRICULTURE

(Monthly, Started in 1979)

No.05, 2020

Main Contents

- Impact of COVID-19 on China's cattle and sheep industry and countermeasures
..... XIONG Xuezheng, YANG Chun, SI Zhizhi (20)
- Research on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entrepreneurship to rural economic growth
..... CHEN Peibin, YANG Jiacan, FANG Yu, et al. (29)
- Achievements, problems and development concepts of Chinese abalone industry
..... ZHANG Hongzhi, WANG Bo, MU Yongtong (39)
- Analysis on China's grain import risks under the uncertain economic and trade environment
..... WANG Rui, LU Genping, CHEN Zhuo, et al. (47)
- China-New Zealand bilateral agricultural exports growth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dual marginal perspective
..... ZHANG Xiaoya, XIAO Haifeng (63)
- Research progress, hotspot and prospect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Bibli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
..... PENG Liang, GAO Weixin (76)
- Italian agriculture under the COVID-19
..... TIAN Jiangshuai (96)
- The construction of Japan's modern flower cold chain logistics system and its enlightenment
..... SUN Xiu, CHENG Shiguo (101)
- Experiences and implications of rural land title registration in Ethiopia
..... HU Yijie, FENG Lei (108)
- Research on driving mechanism of management performance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 LUO Lan, XU Beibei, ZHANG Xiangwei, et al. (119)

Edited by World Agriculture Editorial Office

E-mail: shijenongye2008@126.com

Periodical Publications: No.82-130

Published by Zhongnong Printing Co., Ltd.

Address: No.18 Building Maizidian Street,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100125

Editor in Chief: Yuan Rong

Director of Editorial Office: Xu Hui

Editor: Jia Bin Zhang Xuejiao Du Jing

Tel: 010-59194988/90/32

Fax: 010-65005665

Website: <http://www.ccap.com.cn>

编辑委员会

主任

屈冬玉

副主任

隋鹏飞 陈邦勋 谢建民
杨易 张陆彪 倪洪兴
童玉娥 夏敬源 朱信凯

委员 (按姓名笔画排序)

丁声俊 才学鹏 万建民
马有祥 王广斌 王钊
王林萍 孔祥智 邓秀新
左常升 平瑛 叶兴庆
冯东昕 匡远配 朱明
朱晶 刘天金 刘汉武
刘国道 刘艳 严端祥
杜志雄 李树超 李翠霞
杨万江 杨振海 杨敏丽
何秀荣 宋昱 宋洪远
张广胜 张弘 张兴旺
张安录 张陆彪 张林秀
张显良 张海森 张越杰
陈昭玖 陈剑平 陈萍
陈盛伟 罗必良 周应恒
屈四喜 赵帮宏 赵鸭桥
胡乐鸣 姜长云 贺军伟
聂凤英 聂新鹏 栾敬东
高强 郭沛 唐忠
黄伟忠 黄延信 崔利锋
彭剑良 韩沛新 程国强
程金根 蒲春玲 雷刘功
樊胜根 潘文博 潘利兵
霍学喜

目次

特 载

知名专家学者谈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粮食安全和中国农业影响
程国强 朱信凯 樊胜根 叶兴庆 朱晶
李春顶 邢自强 任泽平 (4)

热点聚焦

欧盟农业政策转型趋势与启示 张云华 赵俊超 殷浩栋 (7)
中国农村中小学生自我控制力水平及其与教育产出的关系
白钰 党瑞瑞 郑丽娟等 (12)

专题综述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牛羊产业的影响及对策建议
熊学振 杨春 司智陟 (20)
企业家精神对农村经济增长的驱动机制研究
陈培彬 杨佳灿 方堉等 (29)
经济学视域下中国鲍鱼产业的成就、问题与可持续发展建议
张红智 王波 慕永通 (39)

政策研究

经贸环境不确定背景下中国粮食进口风险分析
王锐 卢根平 陈倬等 (47)
“第一书记”制度与少数民族地区贫困治理的有效性研究
——基于贵州省麻江县的案例分析 ... 何军 沈怡宁 孙雪峰 (57)

分析预测

中国-新西兰双边农产品出口增长
——基于二元边际视角分析 张晓雅 肖海峰 (63)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主办单位 中国农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指导单位 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
协办单位 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
 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农业行业分会)
 农业农村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

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的研究进展、热点及展望

- 基于 CiteSpace 的文献计量分析 彭亮 高维新 (76)
- 农业社会化服务可否促进农业减量化生产?
 ——基于江汉平原水稻种植农户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杨高第 张露 岳梦等 (85)

环球瞭望

-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意大利农业 田江帅 (96)
- 日本现代花卉冷链物流体系的构建及其启示 孙秀 程士国 (101)
- 埃塞俄比亚农地确权的成功经验及启示 胡依洁 丰雷 (108)

中国农业

- 农田水利设施管护绩效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以陕西省大荔县为例 罗岚 许贝贝 张祥薇等 (119)

国际粮农动态

- 2019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粮食安全和营养所致影响的
 联合声明等 7 则 (128)

贸易监测

- 2020 年 1~3 月中国农产品贸易监测 李蔚青 马景源 (132)
- 2020 年 3 月世界农产品供需形势预测简报 梁勇 韩啸 (135)

英文摘要

- MAIN CONTENTS (140)

主 编 苑 荣
副 主 编 徐 晖
责任编辑 贾 彬 张雪娇
 杜 婧
编 辑 吴洪钟 汪子涵
 郑 君 陈 璿

印 刷 中农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
 (北京 782 信箱)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
出版日期 2020 年 5 月 10 日
邮 编 地 址 100125 北京朝阳区麦子
 店街 18 号楼
电 话 (010)59194988/90/32
传 真 (010)65005665
投 稿 邮 箱 shijenongye2008@126.com
网 址 http://www.ccap.com.cn

广告发布登记:
 京朝工商广登字 20190016 号
ISSN 1002 - 4433
 CN 11-1097/S
 定 价 18.00 元

凡是同意被本刊发表的文章, 视为作者
 同意将其文章的复制权、发行权、汇编
 权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转授给第三方。
 特此声明

本刊所登作品受版权保护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摘编

● 特载

知名专家学者谈新冠肺炎 疫情对世界粮食安全和 中国农业影响

◆ 程国强 朱信凯 樊胜根 叶兴庆 朱 晶 李春顶 邢自强 任泽平

编者按：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粮食安全和国内农业发展的影响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近期，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联系多位专家学者就此进行了解读。从粮食安全、供应链、农产品贸易、宏观经济等方面，专家们提出了抓好粮食和生猪生产、及早谋划紧缺农产品采购、促进农产品出口、加强国际粮农治理、做好中长期政策储备、提高乡村振兴基建投入等建议。现将专家观点摘录如下。

一、程国强（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如果后期世界疫情仍然得不到有效控制，疫情引发全球粮食危机是大概率事件。疫情导致许多国家对粮食市场预期趋紧甚至恐慌，这源于各国对粮食安全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思维，更是对 2008 年全球粮食危机的恐惧记忆。除部分国家已采取粮食出口限制外，随着疫情防控措施加严和延续，可能导致物流中断、交易停顿，加之部分国家干旱、蝗灾影响粮食生产，会进一步强化全球粮食市场不稳定预期。有必要吸取 2008 年粮食危机的教训，警惕和防范来自国际投机资本对粮食市场的炒作，推动全球农产品价格从结构性上涨转向全面上涨，最终酿成全球粮食危机。必须高度重视后期大豆等大宗农产品可能面临的市场风险，及早谋划应对策略。一要管理好输入性的不稳定预期，谨防市场恐慌、抢粮囤粮。二要加强和完善重要农产品储备体系，建立高效安全可控的农产品应急供应保障网络。三要强化全球供应链管理，进一步提高大豆等大宗进口农产品风险防控水平。四要加强国际粮食安全与贸易政策协调，支持

和参与联合国机构开展的援助低收入贫困国家的国际合作。

二、朱信凯（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教授）：疫情使全球粮食安全和中国农产品贸易形势更加复杂严峻，2020 年一季度中国农产品出口受冲击较大。用四句话来概括当前形势。一是世界粮食安全面临大考，平衡结构是关键。初步判断，世界粮食供应总量没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如大米、小麦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很集中，但进口国特别分散，正常情况下没事，可一旦供应不畅、加上贸易限制，缺粮国就特别容易出问题、形成恶性循环。对国内而言，最重要的是抓好生产，真正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二是农产品进口新变化，有的欢喜有的忧。疫情发生以来，不同农产品的进口形势出现分化。1~3 月，大豆进口增长 6.2%、猪肉进口增长 1.7 倍、小麦进口增长 23.1%；大米进口下降 3.9%、棉花进口下降 7.2%、食用植物油进口下降 14%。有些产品的全球需求下降、价格下跌，进口会更加实惠；有些可能会买不着或者涨价，要抓紧时机采购，主动做好储备。三是出口形势太严峻，

农民可能最受伤。1~3月,农产品出口出现较大幅度下滑,总出口下降5.6%,水产品、蔬菜、茶叶出口分别下降18%、3.9%、9.7%。按产业产值和从业人数粗略匡算,仅水产品这3个月出口下降就直接影响了59亿元产值和9.2万人就业,间接影响更大。如果全年农产品出口下降10%,约合550亿元,若以农村人口承担损失计算,人均收入仅此就减少约100元。建议重点扶持和认定建设一批出口规模大、质量安全水平高的出口示范企业和生产基地,稳住农业外贸基本盘。四是农产品价格大波动,涨涨跌跌要看清。2020年以来,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剧,部分产品波幅超过50%。受总需求下降的影响,小麦、大豆、棉花、食糖、食用植物油等价格总体上是看跌的,但是大米等刚性需求产品看涨。不管大涨还是大跌,对国内都会产生传导影响,主要是价格和购买成本问题。最好要加强监测与国际市场信息发布,稳定公众预期,合理引导生产和消费。

三、樊胜根 (中国农业大学讲席教授,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原所长):疫情在全球快速发展,且蔓延至许多本就因冲突、自然灾害或气候变化而深陷食物不安全的国家(地区)。食物安全的风险明显增大,已经不再是一个区域性问題,而是一个需要共同回应的全球性问題。目前,疫情已经扩散到非洲等经济不发达地区,使他们原本脆弱的食物系统雪上加霜。2008年粮食危机和2014年西非埃博拉病毒暴发期间,非洲国家都最先受到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会扩散到全球。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可能零增长或负增长,这意味着增速至少减缓2.5个百分点,按照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的全球模型估计,将导致3000万~4000万人落入贫困和食物短缺处境,其中大部分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的人口。为降低全球粮食危机风险,需要共同努力确保食物供应链的正常运行,并对最弱势群体采取迅速保护和援助。一是促进国际政策协同,在多双边场合积极推动出台不限制粮食出口的原则倡议,避免恐慌性购买加大粮食危机风险。二是推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促进贸易流通,减少非必要的人流、物流限制和对货物贸易的限制措施。三是健全粮农治理体系,创建一个

包括主要国家和国际机构在内的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平台,加强对生产和市场信息的监测分享,提供国际食品标准、抗灾粮食援助协调机制、贸易协调等公共产品。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在抗疫中,通过“绿色通道”等措施保障鲜活农产品供应的经验,值得全世界借鉴。

四、叶兴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疫情防控导致的物流中断以及部分国家出口禁运风险增大,威胁全球农产品供应链。中国进口依存度较高的大豆、食用植物油、食糖等存在保供风险。以大豆为例,中国4~10月主要从南美进口大豆,目前巴西疫情发展很快,对从产区到港口的物流通道的影响明显加大。当务之急:一是防止供应链中断,加大对巴西疫情防控的支持,帮助巴西提高主要物流通道的防护条件;二是做好应对供应链中断的预案,抓住目前巴西物流基本正常的窗口期多进多储,暂停国内乙醇汽油推广计划、减少玉米的工业消耗。建议:一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G20领导人特别峰会上的发言精神,加大力度推动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大宗农产品供应链稳定;二是积极践行G20农业部长应对疫情特别会议声明,加强多边合作,共同维护世界粮食安全;三是推动在世贸组织第12届部长级会议上就严格规范出口限制形成决议。

五、朱晶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疫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农产品市场和贸易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如何未雨绸缪以确保国内粮食安全和农民收入是当前亟须关注的问题。因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恐慌情绪,部分地区民众纷纷开始囤积粮食和食物。与此同时,出于自身粮食安全考虑,已经有部分国家出台限制粮食出口的措施。受“以邻为壑”贸易保护政策和物流不畅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全球农产品市场的供应稳定性有所下降,如果美国等粮食主产国在2020年二季度因疫情恶化而无法正常播种或收获,世界粮价上涨及市场波动的风险将会进一步加剧。对中国而言,短期内疫情不会威胁主粮安全,但将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大豆等进口依存度较高产品的可获性和获得成本,并有可能推高畜牧业生产成本。同时,中国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日韩美欧)先后成为疫情重灾区,优势农产品出口受到很大影响,目前不少农产品出

口企业已经感受到订单减少的压力。后期疫情蔓延会给国外农业用工带来很大压力,蔬菜等劳动密集型的园艺类产品可能供应不足,对中国出口也存在一定机遇。建议:坚定不移夯实农业生产基础,加大支持保障国内生产供应;加强供求信息发布和市场监管,降低恐慌预期,确保国内粮食市场平稳运行;实施多元化进口策略,积极利用国际农产品期货市场,应对世界市场价格波动;密切跟踪全球疫情粮情,推动和引领国际合作与贸易政策协调;加大对出口企业的支持力度,积极寻求新的市场机遇。

六、李春顶(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贸易系主任):疫情在全球暴发和蔓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负面影响预计将大于对制成品出口的冲击。一是目前针对中国货物贸易的限制措施集中在农产品上,已经有30个国家对我出口农产品实施限制,有的限制畜禽产品、水产品,有的限制果蔬产品,有的限制所有农产品,还有的国家加严查验和检疫措施。二是水产、果蔬等生鲜农产品,季节性强、不耐储存,一旦出现延误滞港就会造成较大损失。疫情下农产品出口物流、仓储、检验检疫和清关等时间和费用成本都将上升,违约和延期付款等不确定性风险也将增加。三是对需求弹性较高的农产品消费会出现明显下降,比如我们具有出口优势的水产、果蔬等产品,相对于粮食等基本农产品,其海外消费需求会明显减少,出口很难恢复。四是中国农产品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用工量大,复工后防疫支出、人工成本相对较高。建议根据农业外贸特点,将已出台的小微贷款额度等优惠信贷政策向农产品出口企业倾斜,帮助企业解决短期流动性困难;对农产品出口企业收储加工原料给予补贴,适当延长免缴“五险一金”的时限,降低运营成本;参照美欧等设立农产品出口促进专项资金的通行做法,加大出口促进支持;加强国际间的农业贸易政策协调,防止限制措施扩大化。

七、邢自强(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全球经济衰退已初步显现,外需放缓是对我经济的最直接冲击,首先是出口,随后就是对就业和收入的影响,不亚于2008年金融危机。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将远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定义的2.5%经济衰退荣枯线。预计疫情在二季度造成的全

球总损失相当于2008年整个经济下行期间的损失,美国、欧洲GDP至少萎缩30%,随后即便疫情见顶,经济也将呈U形缓慢恢复,预计欧美需要接近两年才能回到2019年的经济总量。外需放缓是对中国经济最直接的冲击,出口订单损失将使我GDP下降1~2个百分点,再加上对就业、收入的间接影响,可能达3~4个百分点。因此,非常时期宁可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些,特别是针对出口做一些超常规政策储备。农业上也要做好长期应对准备,政策设计可能要考虑未来一到两年。

八、任泽平(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疫情已演变为全球大流行,经济深度衰退程度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除中国、韩国等少数地区外,目前全球大部分地区形势严峻,欧美亚主要经济体均遭受重创,日本疫情二次暴发,印度、巴西等发展中经济体医疗卫生条件差,人口密集,情况混乱堪忧。预计欧美国家疫情将在未来一至两个月后开始缓解,但面临“长尾效应”,彻底结束有赖于疫苗研发和接种。根据模型测算,未来疫情发展有3种情景:乐观情景下,全球感染率0.3%、病死率2.5%~4%,欧美感染320万人以内,疫情于2020年夏天基本结束,上半年对经济冲击较大,但下半年经济快速反弹,影响基本可控。中性情景下,感染率0.6%、病死率3%~5%,欧美感染超过320万人,预计全球实际感染数量3000万人左右,且持续时间达3~5个季度,经济中短期深度萧条,随后逐步恢复。悲观情景下,感染率1%以上,且持续时间较长,导致全球经济大幅衰退,大面积倒闭潮和失业潮。中国面临抗击疫情、复工复产和扩大内需三大战役,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复工复产快速开展,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总需求不足,消费、生产和出口企业订单大幅减少,短期应重点维持对外贸易的稳定。同时,相比欧美目前实施的大规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应启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兼顾短期扩大有效需求和长期供给侧改革。在农业上,可以结合各地发的乡村振兴债券,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集中开展一些基础建设。

欧盟农业政策转型趋势与启示

◆ 张云华 赵俊超 殷浩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 北京 100010)

摘要: 欧盟在其成员国实施统一的农业政策,即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这一政策产生近60年来,已进行3轮大的改革和数次调整,呈现出5个显著趋势:市场支持政策力度越来越小直至微弱水平、农业补贴从与产量挂钩转向与产量脱钩、政策领域从扶持农业生产转向农业农村综合发展、逐步实现绿色生态转型、政策手段先繁后简。这对中国农业农村政策制定有5点启示:一是农产品市场支持政策与农业补贴政策不能总是“慢半拍”,而应与国际节奏保持同步甚至引领;二是市场支持政策应回归本意,着力发挥防范和托底作用;三是优化简化补贴门类,补贴目标由农业生产转向农民收入;四是拓展政策视野,从注重农业产量转向农业综合发展,从关注农业转向农村全面发展;五是提高政策前瞻性,促进农业农村绿色生态转型。

关键词: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转型趋势;启示

DOI: 10.13856/j.cn11-1097/s.2020.05.001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e Policy, CAP)是欧盟在其成员国内统一实施的农业政策。在过去近60年间,欧盟CAP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实行持续、积极和主动的转型,实现了保障农产品供给、与国际市场接轨、保护生态环境和遵守国际贸易准则等多重目标。我们赴欧盟农业与农村发展总司以及丹麦和比利时,对这一政策进行了调研。

1 欧盟CAP转型的5个显著趋势

CAP诞生于1962年,此后在1992、2003和2013年进行了3次大的改革,以这3个节点为划分,欧盟农业总司将CAP分作4个阶段,分别体现了食物安全、市场竞争力、内在可持续和政策效率4种政策导向。除了这3次大的改革,

CAP一直在进行调整,如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2000年议程和2008年健康检查,都有相当幅度的政策调整(表1)。CAP预算按每7年为1个周期进行编制,目前已有2021—2027年的框架计划。欧盟在2018年已经明确,将对2020年后的CAP进行调整。通过对欧盟CAP的转型情况,尤其是对其项目构成、资金预算、操作方式的具体变化进行考察,我们发现5个显著趋势。

收稿日期:2020-04-01。

作者简介:张云华(1976—),山西吕梁人,研究员,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赵俊超(1976—),河北邯郸人,研究员,研究方向:新型城镇化;殷浩栋(1988—),湖南邵阳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表 1 欧盟 CAP 的改革与调整

政策导向	食物安全						
			市场竞争力				
			内在可持续				
	政策效率						
时期	早期 (20 世纪 60 年代)	危机时期 (20 世纪 70—80 年代)	1992 年改革	2000 年议程	CAP 2003 年改革	健康自查 (2008)	CAP 2013 年改革
政策内容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价格支持 生产力改进 市场稳定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过量生产 支出剧增 国际摩擦 供应控制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降价和补偿支付 减少贸易顺差 收入和预算稳定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深化改革进程 农村发展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市场导向 脱钩 交叉遵从 消费者关心的问题 环境保护 扩大第二支柱范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加强 2003 年改革 牛奶配额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绿色化 精准 再分配 停止生产约束 食物链 研究和创新

资料来源：欧盟农业总局。

1.1 市场支持政策力度越来越小直至微弱水平

早期的 CAP，几乎完全是市场支持政策 (market support)。但从 1992 年开始，市场支持的力度迅速降低，被其他政策所替代。从资金数来看，1991 年市场支持预算合计超过 300 亿欧元，包括两个组成部分：出口补贴和价格支持^①。1992 年后出口补贴逐年减少，至 2011 年降低至 0。价格支持几乎同步减少，至 2007 年降低至 30 亿欧元以内，此后基本稳定。从比重上来看，市场支持资金占 CAP 资金的比重从接近 100% 收缩至 5% 以内，迄今一直保持这一水平。

这一政策调整的背后是 CAP 所面临的内部环境的逆转性变化。一是严重的农产品过剩。欧盟^②设立 CAP 的初衷是为了保障农产品自给^[1]，但到 1968 年已出现农产品过剩，至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持续大量过剩，被戏称为“牛奶湖”“红酒湖”“牛肉山”“黄油山”。二是巨大的财政压力。用于 CAP 的资金占欧盟财政预算的比重一直在 60% 以上，占欧盟 GDP 的比例超过 0.6%，各国对此均不堪重负。三是消费者和纳税人的不满越来越强烈。由于价格支持政策，欧盟的食品价格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引发了城市居民的不满^[2]。

市场支持政策在这一背景下逐渐退出。1992 年，欧盟对 CAP 进行改革。一是引入直接支付，依据产量对农民进行补贴；二是大幅降低价格支持水平，使欧盟市场价格更接近世界市场价格；三是每年休耕 15% 的土地，控制生产和补贴的过度增

长；四是开展植树造林、农业环境等项目，增加环境保护投入。此后市场支持政策力度逐渐减弱，目前仅对普通小麦、硬麦、大麦、黄油、脱脂奶粉等 8 种农产品保留有市场支持手段，且由于设定的保护价格水平大幅度低于市场价格，保护机制很少被触发。

1.2 农业补贴从与产量挂钩转向与产量脱钩

产量挂钩支持政策 (coupled support) 在高峰期占到 CAP 资金的 60%，但从 2006 年起挂钩支持政策骤然减少，此后保持在 10% 以内。在 2021 年以后的建议预算中已经看不到挂钩支持政策。取代产量挂钩支持政策的是产量脱钩支持政策 (decoupled support)，其在 2005 年首次出现，并迅速取代前者的地位，占 CAP 资金的比重一直保持六成多到七成，成为目前 CAP 中的主体内容。脱钩支持政策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对农民的直接支付 (direct payment)，占据了 CAP 资金的 71% 和欧盟总预算的 27%。其操作办法是对农业经营者按照其土地数量直接进行收入补贴，不仅包括种植业，而且还包括了畜牧业，对畜牧业按照其农场土地面积进行直接补贴，而与其存栏牲畜数量无关。直接支付在农民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每年平均每个农场可

^① 价格支持类似于中国实行的保护价收购，但内容更为宽泛，机制也更复杂，如其设定目标价格、干预价格和门槛价格 3 个价格，收储既有公共的也有私人的。

^② 当时称为欧共体。

以获得3 500欧元, 平均每亩(1亩=1/15hm²)农业用地可以获得16欧元^①。如果不计算这部分补贴, 农民人均收入只有其他行业平均水平的40%, 而加上这部分补贴后, 农民人均收入达到其他行业平均水平的85%。

这一政策变化的背后主要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贸易规则的压力^[3]。产量挂钩支持政策是在1992年作为对市场支持政策的替代而引入的, 基本做法是根据农产品产量对农民进行补贴。但在WTO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中, 要求各国实质性减少刺激生产的农业补贴政策, 产量挂钩支持政策被视为黄箱政策, 不得大幅度削减。取而代之的是产量脱钩支持政策, 不再依据产量, 而是依据补贴的历史记录和作物面积的历史记录确定对农民的补贴金额。通过这一调整, 欧盟的农业补贴从黄箱政策转变为绿箱政策。

1.3 政策领域从扶持农业生产转向农业农村综合发展

CAP在初期仅限于农业生产扶持, 从1981年起引入了农村发展政策(rural development), 但预算金额微乎其微。从1992年起, 农村发展投入占比明显增加, 至2000年议程中正式形成“两个支柱”(two pillars)格局, 其第二支柱就是农村发展政策。此后在2003年改革中, 第二支柱再次得到强化, 比重达到总预算的25%左右, 此后一直稳定在这一水平。

欧盟农村发展政策的实行是由于其内部禀赋的变化。欧盟在初期成员国只有6个, 此后不断东扩, 20世纪90年代前期增长到12个, 21世纪以后突增为25个, 目前为28个。由于东扩的多为不发达国家, 欧盟农村面积、人口占比不断增长, 内部农村差异化日益加大。特别是一些地区年轻人外出, 人口下降,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严重, 目前60%的欧盟农业劳动力年龄高于50岁, 预计10年后农民数量将减少一半。为了提高欧盟农业竞争力、促进区域平衡发展、改善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 欧盟对农村发展越来越重视^[4]。

欧盟在2014—2020年CAP中将农村发展政策确定为6个优先发展方面: 一是促进农业和农村地区知识传播和创新; 二是促进农场对先进技术的转化能力, 增强农场活力和竞争力; 三是促进农业产

业链发展, 包括农产品加工和营销、增进动物福利和强化农业风险管理; 四是恢复、保护和强化与农业和林业相关的生态系统; 五是提升资源效率, 支持低碳发展; 六是促进社会包容, 减少农村贫困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1.4 逐步实现绿色生态转型

CAP的绿色生态转型始于1992年, 在以直接支付替代价格支持的过程中, 已经体现出环境保护的倾向和间接投入, 如对牲畜饲养密度、强制休耕等制度安排^[5]。2003年改革中又出台交叉遵从原则(cross compliance), 农业生产者只有在切实遵守食品安全、动物福利、农业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规定后才可以获得直接补贴。

CAP中直接的环境保护支出出现在2006年, 在其第二支柱也就是农村发展政策中纳入了保护和气候的内容。欧盟目前生态环境保护中投入最大的一块为绿色直接支付(green payment), 是在2013年改革中提出并在2016年开始实施的。所有成员国必须将30%的直接支付用于绿色直接支付。这两部分内容相加, 大体占到CAP资金的20%左右。绿色直接支付主要包括保持永久性草地直接支付、作物多样化支付、生态重点区直接支付^[6]。以作物多样化支付为例, 10hm²以上的农场必须至少种植2种作物, 30hm²以上的农场至少种植3种作物。农民必须经过改造、申请和验收合格后才可以获得此项补贴。各成员国也必须无条件遵循这一政策, 如有违反会受到削减该国直接支付资金最多25%的处罚。

CAP的绿色生态转型是农业自身发展和外部舆论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7]。在早期, 欧盟一直实行增产导向的农业政策, 农业环境保护受到忽视。农药化肥的广泛施用使地表水和地下水都受到了污染, 连续耕种带来了水土流失问题。从外部环境看, 20世纪70年代后人们的环保意识持续增强, 各种环境保护运动蓬勃兴起。尽管欧盟在农业政策上的生态环保导向已经增强, 农村生态获得改善, 但总是难以达到社会诉求, 因此CAP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程度持续提高。

^① 此为欧盟平均数, 各国标准不一, 如比利时显著高于此标准, 此外不同年份、国内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

1.5 政策手段先繁后简

过去几十年间, CAP 经历了先变繁杂后趋简化的过程。在早期, CAP 只有出口补贴和价格支持两大类, 1992 年改革后变为 4 大类, 至 2016 年已多达 6 大类。大类还可细分, 如直接支付就包括了基础直接支付计划、单一面积支付计划、再分配补贴、自愿挂钩支持等 6 个部分。在已制定的 2021—2027 年建议预算中, CAP 已缩减为 3 大类。CAP 一度变得繁复是目标多元化的结果。在早期, 政策目标仅仅是保障农产品供给和食物安全, 手段也比较单一。此后政策目标越来越多, 新项目的增设使 CAP 越来越完善, 但同时也使其越来越繁杂, 摊子越铺越大。

政策体系的繁杂使 CAP 受到越来越多的压力, 甚至难以为继。一是政策执行成本过高。CAP 内容庞杂, 基本法规 600 多页, 执行文本还有 2 000 多页。层层审核与检查抽查不仅耗费了大量行政资源, 而且效率低下^[8]。二是面临资金缺口。即将脱欧的英国是经费净贡献国, 其脱欧后 CAP 的资金将出现紧缩。三是农民的不满与日俱增。现行 CAP 操作过于复杂, 很多农民往往不知道政策如何运行, 更不知道自己如何才能获得相应补贴。在我们对比利时 5 个农场的调研中, 大多数农场主对现有政策表示不满, 如申领绿色直接支付要求苛刻、手续繁杂, 申领农机补贴不仅要支付评审费且结果还不确定, 他们甚至放弃申请。农民的不满通过欧盟农民联合会和农业合作联盟 (COPA & COGECA)^① 等农业协会组织提出, 对欧盟形成强大游说压力。

2018 年后, CAP 出现简化趋势。从 2021—2027 年的 CAP 计划来看, 政策体系将得到简化, 资金总额、项目类别、操作方式都将发生显著变化。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 一是合并相关项目。绿色直接支付、额外环保激励、交叉遵从标准等会简化调整和归并处理。二是简化申领程序。欧盟已提出通过运用土地使用数据、公共管理数据、农场运营信息等, 简化补贴申领流程, 提高政策效率。三是给予成员国一定的自主权。为了增加 CAP 的灵活性和效率, 在已有各成员国 CAP 资金总额可在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之间调配 15% 资金份额的基础上, 各成员国可以视各自情况从第一支柱向第二支柱调配额外 15% 的资金份额。

2 CAP 转型的启示

CAP 过去几十年间的转型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有效保障了食物供给, 农产品市场持续稳定, 对外贸易实现整体平衡甚至小幅顺差。二是提高了农业发展质量, 农业生产效率、农产品质量安全、生态环保等指标持续提升。三是遵守了国际贸易准则, 改变了过去因市场保护、农业补贴在国际上备受责难的局面, 在 WTO 体系内也未因此受到诉讼。通过对其转型趋势的考察, 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2.1 农产品市场支持政策与农业补贴政策不能总是“慢半拍”, 而应与国际节奏保持同步甚至引领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中国陆续出台农产品市场支持政策和农业补贴政策, 逐步加大农业支持力度。这些政策对促进农业生产取得了良好效果, 但与国际相比在节奏上总是“慢半拍”。欧盟在 1992 年改革后迅速降低其市场支持水平, 而中国在 1993 年开始实施粮食保护价收购、2004 年再开始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等市场支持政策。欧盟从 2006 年起与生产挂钩的补贴支持已骤然减少, 而中国此后至今仍在加强实施生产补贴政策。“慢半拍”的后果是, 我们总是实行别人已弃之不用或慎用的政策, 随着国际规则和贸易格局的变化, 我们因与新规则不符而屡受诉讼。今后, 农业政策制定应紧盯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动向, 加强规则制定中的交流合作, 发挥引领作用, 实现政策节奏的同步性甚至引领性, 避免“慢半拍”的被动局面。

2.2 市场支持政策回归本意, 着力发挥防范和托底作用

中国以粮食最低收购价为核心的农产品市场支持政策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由于其承载目标过多也暴露出一些副作用, 尤其是支持价格长期高于市场价格, 不仅加重了财政负担, 而且由于价格扭曲作用, 在 WTO 框架内正在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欧盟农产品在 20 世纪 80 年代“高支持、高成本、高价格”的矛盾突出, 但通过转型很快消除这一问题, 既遵守了国际贸易准则, 也实现了农产品生产稳定。应当借鉴欧盟经验, 对中国市场支持政

^① 该组织在欧盟 26 个国家拥有 60 个会员, 每个会员都是所在国的全国性组织, 对欧盟具有较强的政策影响力。

策进行调整。一是理顺价格形成机制,农产品价格原则上与国际接轨,避免因市场支持政策产生国内外价格倒挂。二是减少市场支持政策的范围,明确仅对关系国计民生和战略调整的少数品类进行适量、有限度的支持。三是显著下调干预门槛价格,使市场支持政策成为市场失衡等少数极端情况下的非常措施,主要起托底和防范作用。

2.3 优化简化补贴门类,补贴目标由农业生产转向农民收入

中国的农业补贴政策是在不同时期陆续出台的,不仅呈现小而散、碎片化的特征,而且具有显著的增产导向,被WTO视为黄箱政策约束范围。实际上,这些政策中有不少在操作中已成为补贴农民收入政策,仅是戴着一顶黄箱的“帽子”而已。应当借鉴欧盟经验,对农业补贴政策体系进行优化和简化,将一般性的农业补贴明确为农民收入补贴,与产量、品种等指标脱钩,使之成为符合WTO规则的绿箱政策。此外,充分利用WTO允许的微量补贴空间,将之用于少数特定品类农产品的支持,起到国家调节农业生产、引导发展方向的作用。

2.4 拓展政策视野,从注重农业产量转向农业综合发展,从关注农业转向农村全面发展

中国与欧盟在农业农村领域面临类似的境遇,虽都已摆脱了农产品供应短缺的危机局面,但农业缺乏吸引力、农村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仍非常突出。在此背景下,CAP形成两个支柱格局,促进农业农村综合发展,从扶持农业生产转向重视农产品质量、农业生态、农业效率和竞争力等综合发展,从关注农业转向兼顾农村全面发展。CAP转向农业农村综合发展与中国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高度耦合、趋势一致。中国在乡村振兴中可以借鉴欧盟一些成熟的政策与经验。比如,注重政策引导而非政府包办,让农民作为主人翁深度参与而非旁观;支持农村地区知识传播和创新,促进农业先进技术转化,促进农业产业链发展,鼓励青年农民创业等。

2.5 提高政策前瞻性,促进农业农村绿色生态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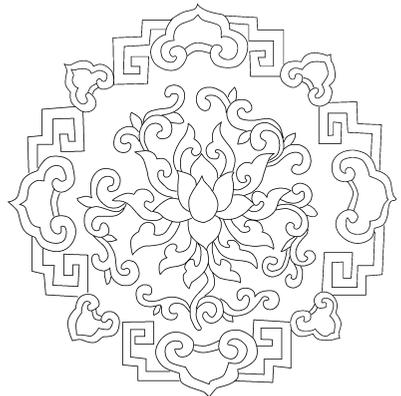
绿色生态转型同样是中国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长期以来,在增产导向政策的作用下,中国农业形成了高度依赖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品的农业发展方式,耕地面源污染、土壤肥力下降、生态结构单一的矛盾非常突出。近年来,中国在控制农药

使用、治理土壤污染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大众期待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应当从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出口竞争力和提升农业发展质量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加强中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政策,重视作物多样性、动物福利等农业环保动向,着力提升政策的前瞻性,实现促进农业生产、提高农产品质量、改善生态环境等目标的统一。

参考文献

- [1] 付岩岩.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演变及启示 [J]. 世界农业, 2013 (9): 54-57.
- [2] 刘武兵.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研究 [M].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 [3] 于晓华, 武宗励, 周洁红. 欧盟农业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国际粮食价格长期波动和国内农业补贴政策的关系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7 (2): 84-96.
- [4] 李登旺, 仇焕广, 吕亚荣, 等. 欧美农业补贴政策改革的新动向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J]. 中国软科学, 2015 (8): 12-21.
- [5] 马红坤, 毛世平.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绿色生态转型: 政策演变、改革趋向及启示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9 (9): 134-144.
- [6] 刘武兵, 李婷. 欧盟 CAP 的直接支付: 2014—2020 年 [J]. 世界农业, 2016 (6): 70-77.
- [7] 马红坤, 孙立新, 毛世平. 欧盟农业支持政策改革方向与中国的未来选择 [J]. 现代经济探讨, 2019 (4): 104-111.
- [8] 张天佐, 张海阳, 居立. 新一轮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的特点与启示 [J]. 世界农业, 2017 (1): 18-26.

(责任编辑 杜 婧 张雪娇)



中国农村中小学生学习自我控制力水平及其与教育产出的关系

◆ 白钰¹ 党瑞瑞² 郑丽娟² 刘国强² 王蕾³

- (1.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兴边富民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81;
2.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 西安 710119;
3. 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西安 710119)

摘要: 自我控制力是构成个体非认知能力的一个重要维度,对义务阶段学生的成长和中国未来人力资本的积累发挥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研究使用中国5省13区县166所中小学16320名农村四年级和七年级的学生数据,探究中国农村地区中小学生的自我控制力水平现状、相关因素及其与学校适应情况(学校喜欢、学校回避、学习态度)、主观幸福感、自信程度(成就感、自我表现、自我效能感)以及学业表现的关系。结果显示,在全部样本中,女性、父母受教育程度对自我控制力水平有正向预测效应,单亲、住校、母亲是农业户口对自我控制力水平有负向效应;四年级样本结果与全样本基本一致,而在七年级样本中,不同的学生特征对七年级学生的自我控制力水平均没有显著的预测效应。自我控制力水平与学生学校适应情况、主观幸福感、自信程度以及学业表现显著相关,四年级和七年级学生与全样本的结果一致。

关键词: 农村中小学;非认知能力;自我控制力;学校适应;主观幸福感;自信;学业表现

DOI: 10.13856/j.cn11-1097/s.2020.05.002

1 引言

非认知能力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个体的学业表现和未来收入水平的高低发挥着重要作用。在 Heckman 等提出的新人力资本框架中,以能力为核心,将人力资本区分为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两部分,并专门强调了非认知能力在个体发展和劳动力市场上发挥的关键作用^[1]。研究表明,非认知能力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业表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此外,非认知能力对个体的工资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传统人力资本理论中关注的“受教育年限”这一核

心变量^[3]。

收稿日期:2020-04-0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703084),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西部贫困地区农村人力资本培育智库建设创新引智基地”(B16031),陕西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专项资助成果(JSJY 2017021)。

作者简介:白钰(1987—),男,陕西延安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儿童早期发展、流动人口及其子女人力资本、农村教育,E-mail:yubai@muc.edu.cn;党瑞瑞(1995—),女,山西吕梁人,硕士,研究方向:儿童早期发展、农村教育;郑丽娟(1995—),女,山西临汾人,硕士,研究方向:儿童早期发展、农村教育;刘国强(1990—),男,陕西榆林人,硕士,研究方向:儿童早期发展、农村教育;王蕾(1975—),女,陕西西安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

通信作者:白钰。

自我控制力是构成个体非认知能力的一个重要维度,其发展与成熟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健全人格发挥了重要作用^[4]。自我控制力作为自我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体社会化的必要心理条件,它是自我意识的体现,也是组成意志行动的重要成分^[5]。自我控制力的发展和成熟与儿童的社会适应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个体的长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6]。此外,自我控制力低下或缺乏也会对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埋下众多隐患。当前社会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如犯罪、艾滋病等性疾病蔓延以及青少年怀孕、吸烟、酗酒、辍学等^[7],都与自我控制力低下或者缺乏有关。在这些问题中,经济的、政治的和社 会的原因是重要的,但自我控制力的缺乏也是原因之一^[7]。

研究表明,自我控制力对学生的教育产出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8-12]。教育产出是社会产出的一个部分,它的产出有别于物质部门,并非物质产品,而是通过对人进行培养而形成劳动能力,是凝结在人身上的知识、技能和形成的人格^[13]。在现阶段,教育产出主要通过学生表现来衡量^[14]。张佳佳通过采用《初中生学习自控力问卷》,对河南省开封地区 576 名初中生进行测试,结果表明,初中生自控力水平与学习成绩呈显著正相关^[10];Tangney 等对 606 名本科生的实证研究表明,自我控制能力更高的人将获得更好的成绩,人际交往能力更强,个人情绪调整得更好^[8];根据孙铃等的研究,儿童在早期的自我控制力水平会对其之后积极的学校适应指标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11];梅松丽等通过采用《主观幸福感量表》和《自我控制力量表》,对长春市 1 551 名初高中学生进行测试,结果显示,学生的自我控制力水平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且自我控制能力对于学生的情绪控制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12]。

尽管现有研究针对自我控制力与儿童教育产出的关系有较多讨论,但仍存在不足。首先,现有研究很少关注农村中小 学生。目前,研究对象主要是 3 岁以下儿童^[15],以及义务教育阶段城镇中小 学生,几乎没有研究涉及占比更大的农村中小 学生。其次,几乎没有研究将小学和初中 学生进行比较,分析义务教育两个不同阶段自我控制力水平、自我控制力

的相关因素以及其与教育产出的相关关系的差异。从中国现实情况看,义务教育阶段城乡教育水平差距大,农村学生学业表现及其长期发展面临巨大的风险挑战^[16]。因此,探究农村地区中小学生的自我控制力水平、影响因素及其对教育产出的关系,对于提升他们的在校学业表现以及中国未来人力资本的积累都有着重大意义^[17]。

本文利用中国 5 省份 13 区县共计 16 320 名农村中小 学生调研数据,分析农村地区中小学生的自我控制力水平,探究农村中小 学生自我控制力水平的影响因素及其与教育产出的相关关系。结合现有研究,本文用学生学业成绩和能够代表学生在校心理状态的学校适应、主观幸福感和自信程度 3 项指标来衡量教育产出。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委托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完成的“梦想中心效果评估追踪项目”数据库基线数据为依托。项目团队通过随机分层抽样选取样本,于 2014 年在全国选取山西、陕西、湖北、贵州、福建 5 省开展项目;选取样本省后,项目团队在样本省随机抽取 13 个县 级行政区(以下简称县)作为样本县,并从样本县教育局取得该县所有中小 学学校名单,随机抽取 166 所完全小学、初级中学与九年一贯制学校;最后,项目团队从样本学校随机抽取四年级和七年级的学生,由于预算约束,每所学校的样本班级个数不多于 3 个班。最终,项目团队共对 18 181 名学生开展问卷调查。调查获得了所在学校的同意与积极配合,于教室进行施测,问卷之前均获得了被测试学生的知情同意。剔除遗漏信息数据后,本研究最终学生样本量为 16 320 名,有效样本率为 89.8%。其中,女生 8 724 名,男生 7 596 名,四年级学生 9 779 名,七年级学生 6 541 名。图 1 给出了本研究的班级抽样规则。

2.2 测量工具

2.2.1 自我控制力水平

儿童青少年自我控制力量表由北京师范大学项目团队修订,以杨丽珠和董光恒编制的自我管理量表中的自我控制力维度为基础进行完善^[18]。该量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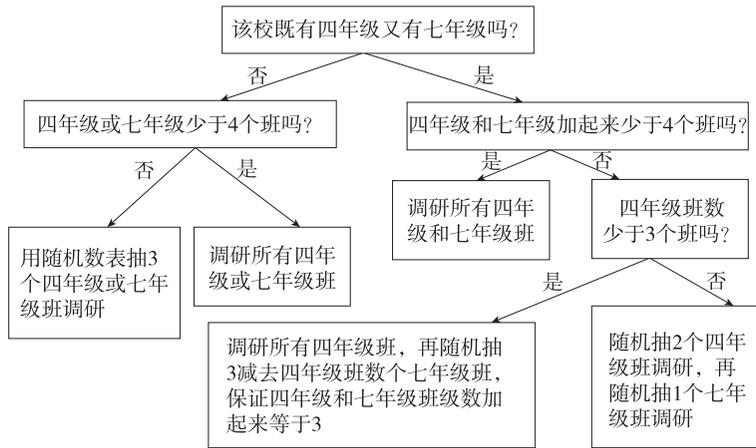


图1 班级抽样规则

主要适用于中国四年级至九年级儿童青少年, 共 5 题, 是单维问卷。量表采用 4 点计分 (从“1=很不符合”至“4=很符合”) 来表示被测试者直接的、短期的期望以及控制冲动的能力^[5]。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为 0.59, 其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拟合指数较为理想, 各项目的载荷在 0.34~0.58, 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2.2.2 学校适应情况

采用学校态度与学习态度量表来衡量学校适应情况。该量表由北京师范大学项目团队进行修订, 以 Ladd 编制、屈智勇等修订的学校喜欢和回避问卷为基础, 增加学习态度维度, 形成了包含学习态度、学校喜欢和学校回避 3 个维度的量表^[19]。该量表主要适用于中国四年级至九年级儿童青少年, 问卷共包括 13 道题目。该量表采用 5 点计分 (从“1=非常不符合”至“5=非常符合”) ^[5,20-21], 通过计算出各维度的均分来判断学生的学校态度与学习态度每个维度的状况。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为 0.72~0.82, 其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拟合指数较为理想, 各项目的载荷在 0.58~0.84, 表明该量表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2.2.3 主观幸福感

儿童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量表由北京师范大学项目团队对幸福感指数量表 (Index of Well-Being) 进行修订而形成^[22], 该量表适用于中国四年级至九年级儿童青少年^[5,23], 问卷共包括 9 道题目, 询问了学生过去几周在两个维度的真实感受——学生总体情感指数以及生活满意度^[5,24], 并根据这两个维度得分计算出幸福感量表总分 (总体情感指数×1+生

活满意度×1.1)。该量表采用 7 点计分, 幸福感量表总分越高, 表明个人幸福感越强。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为 0.87, 其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拟合指数较为理想, 各项目载荷在 0.59~0.73, 表明该量表有较好的结构效度^[5,25]。

2.2.4 自信程度

儿童青少年自信量表由北京师范大学项目团队修订, 对王娥蕊和杨丽珠^[26]编制的 3~9 岁儿童自信心教师评定问卷进行改编^[5], 形成了包含成就感、自我表现和自我效能感 3 个维度的儿童青少年自信量表。该量表共包括 17 道题目, 采用 4 点计分 (从“1=很不符合”至“4=很符合”) 来表示青少年的自信程度^[5,20-21,27]。通过计算得出各维度的均分来判断学生的成就感、自我表现和自我效能感高低。此外, 计算得出自信总均分 (各维度均分之和/3), 均分越高, 表明被测试学生的自信程度越高^[5]。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为 0.48~0.88, 其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拟合指数比较理想, 各项目载荷在 0.39~0.76, 表明该量表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2.2.5 学业表现

本研究采用标准化数学考试衡量学业表现。考试题目由专家根据国际通用的数学测试和国家课程标准以及学生的所在年级进行设计。学生在拿到试卷之后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研员监督, 对题目进行作答, 答题时间规定为 30 分钟。在调研过程中, 调研员使用统一的现场交流语言, 确保所有施测学生听到一致的指导信息, 从而尽可能地避免其他因素的干扰。数学测试卷由项目团队预先打印出来后带到调研地点, 以确保来自不同省份的学生使用相同

的数学测试卷来检验数学水平，考试前任何样本地区师生没有接触过试卷。

2.2.6 学生基本情况调查问卷

问卷由学生的个人情况、家庭背景和学校背景 3 部分组成。包括学生的性别、年级、民族、是否住校、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工作类型、父母户口类型、是否为单亲家庭、是否为独生子女等信息，由学生在问卷上填写完成。

2.3 统计方法

本文使用 Stata14.2 进行数据分析。使用最小二乘法分析自我控制力的相关因素及其与上述教育产出的关系。由于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各项生理指标存在着较大差异，在对全样本进行自我控制力影响因素分析的同时，也按年级将学生分开进行年级组别内的影响因素分析。模型如下：

$$Y_{edu_i} = \alpha + \beta X_{self_i} + \theta X_i + \epsilon$$

其中， Y_{edu_i} 代表学生教育产出各项指标，包括学校适应情况（学校喜欢、学校回避、学习态度）、主观幸福感、自信程度（成就感、自我表现、自我效能感）和数学成绩。 α 代表回归方程的常数项， X_{self_i} 代表学生的自我控制力水平， β 值代表自我控制力水平

对学生教育产出的相关性系数， X_i 代表控制变量，包括学生特征变量，如性别、民族、是否住校、是否为单亲家庭、是否为独生子女，以及各项家庭情况如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父母是否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父母的户口类型， ϵ 代表随机误差。

3 结果分析

3.1 样本学生特征及家庭特征

样本基本特征如表 1 所示。总体来看，样本学生中女性占 47%，92% 为汉族，单亲家庭占比 7%，21% 为独生子女，住校生占比 34%。父亲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 71%，母亲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 61%，样本学生父亲务农的比例为 21%，母亲务农的比例为 25%，父亲户口类型为农业户口^①的比例为 81%，母亲户口类型为农业户口的比例为 80%。

表 2 描述样本学生自我控制力水平，以及学校适应情况（学校喜欢、学校回避、学习态度）、主观幸福感、自信程度（成就感、自我表现、自我效能感）和数学成绩。可以看出无论是自我控制力水平，还是教育产出指标，四年级和七年级学生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 1 样本学生特征及家庭特征

特征	全部样本		四年级		七年级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1) 性别 (1=女; 0=男)	0.47	0.50	0.46	0.50	0.47	0.50
(2) 民族 (1=汉族; 0=非汉族)	0.92	0.27	0.90	0.31	0.96	0.20
(3) 是否为单亲家庭 (1=是; 0=否)	0.07	0.26	0.08	0.27	0.06	0.24
(4) 是否为独生子女 (1=是; 0=否)	0.21	0.41	0.23	0.42	0.19	0.39
(5) 平时主要住校 (1=是; 0=否)	0.34	0.47	0.17	0.37	0.59	0.49
(6) 父亲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 (1=是; 0=否)	0.71	0.45	0.72	0.45	0.68	0.47
(7) 母亲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 (1=是; 0=否)	0.61	0.49	0.63	0.48	0.58	0.49
(8) 父亲工作类型 (1=务农; 0=非农业)	0.21	0.41	0.16	0.37	0.28	0.45
(9) 母亲工作类型 (1=务农; 0=非农业)	0.25	0.43	0.19	0.40	0.33	0.47
(10) 父亲户口类型 (1=农业; 0=非农业)	0.81	0.39	0.75	0.43	0.90	0.30

① 根据 2014 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编者注。

(续)

特征	全部样本		四年级		七年级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11) 母亲户口类型 (1=农业; 0=非农业)	0.80	0.40	0.74	0.44	0.90	0.30
样本量	16 320		9 779		6 541	

表 2 学生自我控制力与教育产出现状

指标	全部样本		四年级		七年级		两个年级差异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p 值
(1) 自我控制力 (1~4 分)	3.04	0.62	3.14	0.61	2.90	0.60	<0.001
(2) 学校喜欢 (1~5 分)	3.94	0.94	4.21	0.81	3.54	0.99	<0.001
(3) 学校回避 (1~5 分)	1.95	0.94	1.77	0.88	2.21	0.97	<0.001
(4) 学习态度 (1~5 分)	3.90	0.80	4.08	0.73	3.64	0.83	<0.001
(5) 学生幸福感指数 (2.1~14.7 分)	10.62	3.06	10.88	3.13	10.24	2.92	<0.001
(6) 自信总分 (1~4 分)	2.79	0.47	2.85	0.46	2.69	0.47	<0.001
(7) 成就感 (1~4 分)	2.81	0.67	2.76	0.69	2.88	0.63	<0.001
(8) 自我表现 (1~4 分)	2.48	0.69	2.62	0.68	2.25	0.65	<0.001
(9) 自我效能感 (1~4 分)	3.07	0.54	3.16	0.52	2.95	0.54	<0.001
(10) 数学成绩 (1~29 分)	19.13	5.98	22.29	4.64	14.40	4.45	<0.001
样本量	16 320		9 779		6 541		

注: 四年级数学成绩为 1~29 分, 七年级数学成绩为 1~23 分, 在使用总样本的回归中, 对数学成绩分年级进行标准化处理。

3.2 农村中小学生自我控制力水平的相关因素

从表 3 可以看出, 性别、是否住校、是否为单亲家庭、父母受教育程度、母亲户口类型等变量均显著影响自我控制力水平。其中, 女生、父母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对自我控制力水平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单亲家庭、住校、母亲是农业户口对自

我控制力水平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民族、是否为独生子女、父母的工作类型等因素对样本学生的自我控制力水平无显著影响。四年级样本结果与全部样本结果基本一致, 而在七年级样本中, 父亲是农业户口对自我控制力水平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表 3 自我控制力相关因素多元回归分析

特征	自我控制力均分		
	全部样本	四年级	七年级
(1) 性别 (1=女; 0=男)	0.07*** (0.01)	0.11*** (0.01)	-0.01 (0.02)
(2) 民族 (1=汉族; 0=非汉族)	0.03 (0.02)	0.10*** (0.02)	-0.02 (0.04)
(3) 是否为单亲家庭 (1=是; 0=否)	-0.05*** (0.02)	-0.08*** (0.02)	-0.02 (0.03)
(4) 是否为独生子女 (1=是; 0=否)	0.00 (0.01)	0.00 (0.01)	-0.00 (0.02)
(5) 平时主要住校 (1=是; 0=否)	-0.07*** (0.01)	0.03* (0.02)	0.02 (0.02)

(续)

特征	自我控制力均分		
	全部样本	四年级	七年级
(6) 父亲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 (1=是; 0=否)	0.05*** (0.01)	0.08*** (0.02)	0.01 (0.02)
(7) 母亲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 (1=是; 0=否)	0.07*** (0.01)	0.10*** (0.01)	0.02 (0.02)
(8) 父亲工作类型 (1=务农; 0=非农业)	0.01 (0.02)	0.03 (0.02)	-0.01 (0.02)
(9) 母亲工作类型 (1=务农; 0=非农业)	-0.02 (0.01)	-0.04** (0.02)	0.01 (0.02)
(10) 父亲户口类型 (1=农业; 0=非农业)	-0.02 (0.02)	0.00 (0.02)	-0.06* (0.04)
(11) 母亲户口类型 (1=农业; 0=非农业)	-0.04** (0.02)	-0.03 (0.02)	0.03 (0.04)
常数项	2.99*** (0.02)	2.90*** (0.03)	2.93*** (0.05)
调整 R^2	0.018	0.030	-0.000
样本量	16 320	9 779	6 541

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3.3 农村中小学生学习产出与自我控制力的关系

由表 4 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全样本中,还是在四年级样本,或者七年级样本中,教育产出各项指标与自我控制力水平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1) 自我控制力水平越高,学生学校适应越好。结果显示,自我控制力与学校适应 3 个维度均有显著相关关系。在全样本、四年级学生群体和七年级学生群体中均达到 1% 的显著性水平。其中,学生的自我控制力水平与学校喜欢呈显著正向相关关系,与学校回避呈显著负向相关关系,与学习态度呈显著正向相关关系。这表明学生自我控制力水平越高,学生就会表现出越积极的学习态度,就更愿意去认真学习。

(2) 对于学生的幸福感指数,自我控制力水平

与之呈显著正向相关关系,并在全部样本、四年级学生群体和七年级学生群体中均达到 1% 的显著性水平。

(3) 自我控制力对于自信总均分以及自信量表 3 个维度均呈显著正向相关关系,表明自我控制力水平越高,学生表现得越自信。具体来讲,自我控制力越高的学生,个人成就感水平越高,获得成就时的自我体验感越良好;自我控制力水平越高的学生,也越倾向于表达自己的感受;同时,学生的自我控制力水平越高,他们对自身能力的评价就越高,也更倾向于积极正面地评价自身能力。

(4) 自我控制力与学生的标准化数学成绩也呈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即自我控制力越高的学生,数学成绩也越好。

表 4 自我控制力与教育产出的相关性分析

项目	样本	指标	学校适应情况			主观幸福感	自信程度				学业表现	样本量
			学校喜欢 均分 (1~ 5分)	学校回避 均分 (1~ 5分)	学习态度 均分 (1~ 5分)	学生幸福 感指数 (2.1~ 14.7分)	自信总 均分 (1~ 4分)	成就感 均分 (1~ 4分)	自我表现 均分 (1~ 4分)	自我效能 感均分 (1~ 4分)	数学成绩 标准分数 (标准差)	
自我 控制力 均分	全部样本	控制变量 调整的 R ²	0.55*** (0.01) 是 ^a	-0.38*** (0.01) 是 ^a	0.49*** (0.01) 是 ^a	1.08*** (0.04) 是 ^a	0.31*** (0.01) 是 ^a	0.11*** (0.01) 是 ^a	0.43*** (0.01) 是 ^a	0.38*** (0.01) 是 ^a	0.12*** (0.01) 是 ^a	16 320
	四年级	控制变量 调整的 R ²	0.46*** (0.01) 是 ^a	-0.30*** (0.01) 是 ^a	0.42*** (0.01) 是 ^a	1.09*** (0.05) 是 ^a	0.30*** (0.01) 是 ^a	0.12*** (0.01) 是 ^a	0.42*** (0.01) 是 ^a	0.35*** (0.01) 是 ^a	0.18*** (0.02) 是 ^a	9 779
	七年级	控制变量 调整的 R ²	0.55*** (0.02) 是 ^a	-0.42*** (0.02) 是 ^a	0.49*** (0.02) 是 ^a	0.97*** (0.06) 是 ^a	0.30*** (0.01) 是 ^a	0.15*** (0.01) 是 ^a	0.37*** (0.01) 是 ^a	0.38*** (0.01) 是 ^a	0.05*** (0.02) 是 ^a	6 541

注: *** $p < 0.01$; ^a 回归模型控制了学生性别、民族、是否为单亲家庭、是否住校、是否为独生子女、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的工作类型和父母的户口类型。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了农村地区中小学生的自我控制力水平。研究结果显示,学生的个人特征以及家庭特征会影响他们的自我控制力水平。除此之外,自我控制力水平与学校适应情况(学校喜欢、学校回避、学习态度)、主观幸福感、自信程度(成就感、自我表现、自我效能感)以及学业表现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学生的个人特征以及家庭特征会影响学生的自我控制力水平。总体上说,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样本是女生、父母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对农村中小学生的自我控制力有正向预测效应,单亲家庭、住校、母亲是农业户口有负向预测效应。张佳佳发现女生和低年级学生倾向于拥有更高的自我控制力水平,这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10]。在四年级学生中,样本是女生、汉族、父母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对自我控制力有正向预测效应,而住校也对小学生的自我控制力有正向预测效应,究其原因可能是住校的小学生相对于非住校生,有更高的独立性,而高晶和马艳萍的研究显示,独立性较高的小学生倾向于拥有更高的自我控制力水平^[28]。从家庭层面来

看,父母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对学生的自我控制力有正向预测效应,这可能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倾向于采取更合理的养育方式,同时,他们能够与子女保持更亲密友好的互动,这有利于儿童青少年自我控制力水平的发展^[29-30]。在七年级学生群体中,性别、民族、是否住校、是否为单亲家庭、是否为独生子女等均无法预测学生的自我控制力水平。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农村七年级学生的自我控制力水平相比于四年级而言下降许多,以至于不同特征样本群体之间自我控制力水平差异极小,因此在四年级不同特征样本群体中存在的显著性差异,随着自我控制力水平下降,在七年级样本群体中逐渐消失,这一研究结论与王红姣和卢家楣的结论一致^[31]。

在学校态度上,学生自我控制力水平与学校喜欢呈显著正向相关关系。其中原因可能是学校能够帮助学生学习知识,学生自我控制力水平越高,越容易适应学校生活,内化学校规则,对学校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态度。同时,学生自我控制力水平越高,学习态度也通常更加积极和稳定。可能的原因是学生自我控制力水平越高,越有能力融入学校生活,因此更加可能形成积极的学习观念,并对学习持有

更积极的态度。该结论与孙玲等的结论一致^[11]。

在主观幸福感上,学生的自我控制力水平与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指数呈显著正向相关关系,自我控制力水平越高的学生倾向于拥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指数。该结论与梅松丽等^[12]、郭金花和梅松丽^[32]的研究一致,不同的是他们的研究更多地把自我控制力作为中介变量使用,而本研究则更多地关注自我控制力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在自信程度上,学生自我控制力水平与学生的自信程度呈显著正向相关关系。学生的自我控制力水平越高,就越容易在学校生活中取得成就并适应规则,他们对自身能力的评价也越高,更倾向于积极正面地自我评价,从而具有更高的自信分数。本研究和王娥蕊和杨丽珠使用了同样的维度^[26],从成就感、自我表现、自我效能感3个维度来观测学生的自信程度,目前尚未有研究来探究学生的自信程度和自我控制力之间的相关性。

在标准化数学成绩上,学生自我控制力水平与学生的标准化数学成绩呈显著正向相关关系。这表明具有较高自我控制力的学生往往有着比自己同龄学生更高的数学成绩,无论是在四年级还是七年级学生样本群体中。由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数学成绩通常与其他科目成绩显著相关,因此也可以预测农村中小学生在学校的学业表现。该结论与张佳佳的结论一致^[10]。

自我控制力水平在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教育产出及以后的长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自我控制力缺乏不仅会影响个体长远的发展,也会对社会和国家发展埋下众多隐患。在义务教育阶段,应加强对自我控制力的关注,尤其重视男生、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高年级、住校、单亲家庭学生的自我控制力培养。通过对自我控制力的加强和提升来促进农村学生学校适应性、主观幸福感、自信和学业表现,进而为人生发展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HECKMAN J J, STIXRUD J, URZUA S. 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abilities on labor market outcomes and social behavior [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06, 24 (3): 411-482.
- [2] 李丽, 赵文龙, 边卫军. 家庭背景对非认知能力影响的

- 实证研究 [J]. *教育发展研究*, 2017, 37 (1): 45-52.
- [3] 乐君杰, 胡博文. 非认知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7 (4): 66-76+127.
- [4] 田莲, 郭成. 教育领域中的自我控制研究进展 [J]. *教学与管理*, 2008 (33): 3-4.
- [5] 刘国强. 农村中小學生自我控制力水平与其在校表现的关系研究 [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18.
- [6] 叶小红. 幼儿自控能力发展与培养的研究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 [7] 谭树华, 郭永玉. 可一不可再: 自制力消耗效应研究 [C]. 第十二届全国心理学学术大会论文摘要集, 2009: 687-688.
- [8] TANGNEY J P, BAUMEISTER R F, BOONE A L. High self-control predicts good adjustment, less pathology, better grades, and interpersonal succes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004, 72 (2): 271-324.
- [9] KING K M, FLEMING C B, MONAHAN K C, et al. Changes in self-control problems and attention problems during middle school predict alcohol, tobacco, and marijuana use during high school [J]. *Psychology of Addictive Behaviors*, 2011, 25 (1): 69-79.
- [10] 张佳佳. 初中生学习自控力与注意稳定性、学习成绩的关系及其教育启示 [D]. 郑州: 河南大学, 2011.
- [11] 孙铃, 梁宗保, 陈会昌, 等. 儿童2岁活跃性、自我控制与5年后学校适应: 父母养育方式的调节作用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4, 30 (1): 9-15+23.
- [12] 梅松丽, 柴晶鑫, 郭金花. 青少年主观幸福感与网络成瘾: 自尊及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5, 31 (5): 603-609.
- [13] 邓慧萍. 经济增长中教育产出效应的度量方法与实证分析 [J]. *当代财经*, 2004 (8): 127-129.
- [14] COLEMAN J S.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J]. *Integrated Education*, 2006.
- [15] 闻莉. 儿童自我控制研究综述 [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8, 28 (S2): 100-102.
- [16] 朱德全, 李鹏, 宋乃庆. 中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报告: 基于《教育规划纲要》第三方评估1的证据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7, 35 (1): 63-77+121.
- [17] 高鸣, 武昀寰, 邱楠.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人才培养: 国际经验视角 [J]. *世界农业*, 2018 (8): 176-182.
- [18] 杨丽珠, 董光恒. 3~5岁幼儿自我控制能力结构研究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5 (4): 7-12.
- [19] 屈智勇, 邹泓, 王英春. 不同班级环境类型对学生学校适应的影响 [J]. *心理科学*, 2004 (1): 207-211.
- [20] 李白璐, 边玉芳. 初中生生活满意度的发展趋势及社会支持、自尊的影响: 一项3年追踪研究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6, 24 (5): 900-904+877.

(下转第38页)